

近代中国

【第十八辑】

Jindai Zhongguo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代中国

JIN DAI ZHONG GUO

第十八辑

主 编 陈 绂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凤麟 沈渭滨 易惠莉

编辑部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烈 杨国强 徐元基

顾卫民 唐国俊 廖大伟

戴鞍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 第十八辑/上海中学学社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45-219-5

I. 近… II. 上…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794 号

近代中国 第十八辑

编者: 上海中学学社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300

ISBN 978-7-80745-219-5/K·03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辑出版得到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的资助，特此致谢。

《近代中国》编委会名单

主编 厉无畏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烈 毛增滇

冯德康 过传忠

沈祖炜 邹逸麟

项斯文

目 录

孙 中 山 研 究

- 对清末新政时期孙中山历史定位的浅见 李玉贞/1
 《香山循报》所见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后的香山县
 黄健敏/20

近代中国政治

- 光绪六、七年的晚清中国政坛——以刘坤一与李鸿章
 之争为中心的考察 易惠莉/38
 “督抚革命”与“督抚式的革命” 蒋永敬 庄淑红/80
 从“维新”到“新政”——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启示 黄明同/98
 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郭绪印/109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
 饶怀民 黄俊军/130
 从立宪新政到辛亥革命的徐绍桢 陈正卿/158
 清末新政·咨议局·陈炯明 陈昌福/171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

- 自强运动前期之仿造轮船与停造争议之朝野驳论 王尔敏/193

“我的朋友胡适之”: 1920 年代的胡适与清遗民

..... 林志宏/224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普及政策的出台与施行 张小莉/254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

晚清时期女性参与革命运动之探讨

(1894~1911) 邵宗海 刘明香/268

清末新政与中国西部 戴鞍钢/287

近代天津商人城乡家庭经济型态一例: 什季堂李氏文书

初探 [美] 关文斌/297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金融企业的发展——以川康兴业

公司为例 刘素芬/322

学会在中国做生意: 英美烟公司香烟经销网的演变, 1902~

1941 [英] 霍华德·考克斯著 皇甫秋实译 孙 晓校/358

不能忘却的“范氏情结”——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事业

..... 赵 津 李健英/399

试析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的作用和影响 王昌范/416

史料辑存与研究

文廷式《知过轩谭屑》 王尔敏提供 陈 绛点注/426

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资料

..... [日] 大里浩秋/464

翁同龢晚年居处考 仲伟行/501

学 术 动 态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戴 伟/511

孙中山研究

对清末新政时期孙中山历史定位的浅见

李玉贞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学习西方变法的“上谕”,迈开了十年新政的第一步。1905年有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清廷宣布“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不管大清帝国统治者对宪政的理解是否深刻或是否“正确”,比之于戊戌变法时期,政情毕竟有了很大改变,倡言宪政者有了话语权。中国宪政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整顿吏治,改革官制,废科举、兴学堂,振兴商务,开发实业,修改律制,编练新军。辛亥革命前的10年肇启了一个有声有色相当活跃的改革时期,值得用浓重的笔墨书写。试想像辛亥革命前一年几乎遍及全国的请愿运动,那当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壮观景象。那不是立宪派、改良主义者的大表演,而是东方一个文明古国为摆脱中世纪状态而迈出的最早的步伐。新政,无论其成功或失败,其复杂与曲折,无不涵养着后人,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有学者称,“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①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应当从国家发展的宏观图景上予以分析,而不是囿于某种“主义”多

① 辛子陵《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北京:《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第29页。

年形成的金科玉律,大而化之地冠以革命或保守或反革命。对孙中山的评价也是一样。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守旧、改革、革命三种力量在博弈,三种力量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做着尝试,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步伐,都为我国历史积累了“财富”。不过它们的立场也因政局的变幻而变幻,三派的人都怀抱强烈的使命感在探索,它们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很难说张三始终是正确的革命派,李四始终是错误的,更难用所谓是否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途径彻底推翻清王朝作为标准来界定张三革命、李四保守。然而,苏联解体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中苏研究者大致取相同的看法。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但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题目,本文仅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以当时的出版物为依据和背景,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孙中山,“革命派”与“保皇派”

19世纪末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表述的是通过发展实业的途径达到社会改造、国家富强的目的,明显地寄希望于清廷采取各种措施以达到地能尽其利,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①后来见“和平之法无可复就”,“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易以强迫。”特别是1900年后“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②孙中山在改造社会的观念和道路的选择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窃以为未必要用什么“进步”来衡量。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8页。

② 同上,第6卷第235页。

这不过是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脚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通过组织和整合革命力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管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包含有多少模糊甚至错误观念如排满，它毕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孙中山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甚至招募了一批“保皇军”，并努力使之正规化，提高其战斗力。“保国、保种、保政”——康有为的思想和活动离不开一个“保”字。“顺理成章”成了保皇派。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谋求过合作，但未有结果。梁启超在1907年与马相伯等立宪派在东京成立以实行宪政为宗旨的政党——政闻社，但他们坚持的依然是有别于同盟会的行动方针。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在排满问题上与孙中山、汪精卫等有分歧，被指“妖言惑众”^①，那么，形势的发展使他们的争论愈演愈烈，《民报》1905年创刊后就针对康梁的言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②发出了强烈指责。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也不甘示弱。论战开始，梁启超认为“倘民智不开，而民气又盛，则人人有破坏心，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城墟而已”。他引用德国波伦哈克的观点说：“因革命而得政体者常危”，因为在革命大暴动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③就这样，《新民丛报》被列出十二罪状。^④孙中山把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派势力冠以“反革命”，宣示与之“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并与之“作战”，并请革命队伍的人不要“中康之毒”，“当竭力大击保

① 精卫(汪兆铭)《民族的国民》，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卷上册，第98页。

② 饮冰(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同上，第165页。

③ 同上，第166页。

④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73页。

皇毒焰于各地”。的确,对于当时流行的关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或种族革命等学说,梁启超的批评也相当激烈。他认为,“鼓吹革命者”,大多是“率先破坏之一团”。他们利用的是“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其结果只能是“必而荼毒一方”。^①

按照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苏联史学的理论,梁启超反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暴力革命,理所当然地立于革命派之外,甚至孙中山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因他追求的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种简单的类比,使问题过于“简章化”、教条化,特别重要的是这种类比并不能说明辛亥革命前清末的历史环境,因而也就不能对孙中山等人作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二、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刊物

据上述相似的标准,那一时期的出版物,也有了“改良”或“革命”的定性。仅以1905~1907年间为例,《民报》被列为“当时出版的革命刊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刊物”。而梁启超等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编辑、撰稿、发行的《新民丛报》、《东方杂志》、《中国新报》、《政论》等刊物“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经过武装起义,彻底摧毁清王朝”,^②便属于改良主义刊物。

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刊物的出版本身,透视出革新潮流不可阻挡,连清廷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查封这些刊物或者追究其创办者“政治”责任;二是说明除孙中山外,新政时期的这些刊物,无论它们是什么政治倾向,都同样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宝库,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序言第4页。

② 同上,序言第7页。

由于苏联史学的长期影响,我们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时候往往以列宁或俄共-联共(布)的观点为转移,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称作修正主义,并照搬这种观点到中国,通过简单的类比,把梁启超等各种人物分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保皇派、不彻底的革命者,由此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何以提出自己的主张,何以坚持自己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分析,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因此,看一看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哪怕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也能粗浅地体会到他们的价值。

第一,这些刊物的内容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反映出他们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强烈的使命感。正是这一切驱使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甚至冒着风险去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吴稚晖、李石曾、叶夏声、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多半身居国外,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共同点是既目睹中国国力贫弱和民不聊生的情况,又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带给人民的福祉及相伴而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他们了解这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动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或因政见相同而纷纷组党,或因政见分歧而组织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中国这一批精英努力探索和追求,他们首先力图理解和介绍外国情况,以唤醒国人。而每人的国内外处境和地位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吸收和介绍国外情况时的不同观点和政治主张。同盟会的成员特别是孙中山等在日本接触过俄国民粹主义人士该鲁学尼、鲁塞尔等,民粹主义的观点和有组织的暗杀等行动对同盟会的成员产生了影响,民粹派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主张,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思想,引起同盟会成员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民报》会用那样多的篇幅报道俄国政情,以高昂的热情讴歌1905年

俄国人民斩木揭竿,风起云涌的革命局面。

这一批人士知识的渊博和对世界情况的了解,到今天也依然应当令人敬佩。无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或改良派的刊物对世界动态的报道都是十分及时而全面的。从这些刊物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国际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而且能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重大问题在这些刊物上都有反映。如:

从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马尔克”[马克思]中^①,证明朱对《共产主义宣言》[共产党宣言],对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有了基本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做了一番调查,看到该书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既颁布,家户诵之”^②的情况后,几乎是与世界同步向国人做了介绍。朱执信对李嘉图、亚当·斯密等人的名著,对《资本论》的价值以及它们在国际上引起的争论也了如指掌。这种负责任地研究外国理论和了解外国状况的精神,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梦蝶生即叶夏声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③客观地介绍了欧洲这一重要流派的状况。李石曾以“民”的笔名发表的文章《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一文,十分值得注意。^④请看他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认识,他说:共产主义“以其所倡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之说,最利于多数之贫民,以故生计界之不得志者,群焉趋之若鹜,几奉为民生之救主,而不悟其足以召乱而蹙国,正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李氏认为“贫人讲共产主义,实在是他的本分。争了私产来,化为公共所有,那自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133~143 页。

^② 同上,第 139 页。

^③ 《民报》第 7 期,1906 年 9 月,同上,第 490~497 页。

^④ 《新世纪》第 72 期,1908 年 11 月 7 日,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3 卷第 221~229 页。

然无‘生计界之不得志者’，因人人已有所应受的一分了”。^①

他的表述，说明他对共产主义实质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共产主义，全为大多数贫民设法，并非要富国强兵。论者弄错了念头，横着两个“叛乱”与“祖国”成见在胸中，便骂人召乱，自称“爱国”。他说，共产主义足以召乱而蹙国，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错，正要召乱，正要蹙国。召乱，然后可以拨乱反正，以杜天下之大患；蹙国，然后世界可以大同，同进增人类正当自然之幸乐”。^②他进而解释说，共产主义没有什么法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它的大纲。私产主义，利于少数资本家；共产主义，自然利于多数贫民。故共产主义之合于公道，真理，不待明言。^③有趣的是，若论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按照苏联的史学理论，也应该给李氏记上浓重的一笔，而不是“批判”他的志同道合者为“资产阶级”革命者或者以此为棍子把他们置于死地。如果把时间后推至1917年苏俄革命后，那么，他堪称最早“拥护”苏俄革命的人了。

吴稚晖以“燃”和“四无”的笔名发表《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④等文章则见证了无政府主义等国际思潮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影响。

至于日本情况，因持各派政见的人群许多都在日本，与日本普通人甚至政界上层都有密切交往，所以介绍的更多。

如果说同盟会的《民报》表达的是其成员们热情讴歌俄国志士“斩木揭竿，风起云涌的革命局面”，且“自愧不如”，愿以之为例，所以不惜笔墨予以报道，那么，素主“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立宪派、

① 《新世纪》第72期，1908年11月7日，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24～225页。

② 《新世纪》第72期，1908年11月7日，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25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28、224页。

④ 同上，第214～220页。

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者,对相应时期俄国的了解也毫不逊色,在一些方面甚至有独到之处,自有其独到之处。试以他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一文为例。梁氏对俄国历史、政情的分析,各派政治势力的主张,甚至对于沙皇设立第三局(即检查制度)^①对付革命志士的情况,都有确实的了解。^②他把持有民粹主义观点的赫尔岑(梁作:耶尔贞)比作“法国之有孟德斯鸠、卢梭、福禄特尔”。^③他同样看到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看到俄国政府慑于革命工农的压力“遂不能不屈于其民”。^④更令我们惊奇的是,他对俄国人在1905年革命问题上不同立场的了解竟如此深入细致而准确。仅举他对托尔斯泰的叙述为例,他知道这位文豪同情俄国革命,同时他更加赞同托氏的观点,认为“今者全俄大多数之人,皆未解革命之为何物”,便“汹涌”起来,但是革命者皆贫“无立锥地,其力曾不足以谋武器之供给”,遇到政府军“以千钧之弩溃痈也。”再看托氏眼中的俄国革命前途:只有到“宗教的、智力的、经济的三种教育,循自然之趋势臻于完备,乃以无血革命收全功焉”。^⑤如果将其与两年后列宁的著作《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⑥相比,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史实和托翁观点的紹介上,他与列宁没有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结论,这是作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之间命定的天地之别。列宁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而梁启超则同情托氏眼中的俄

① 俄文为 Цензура,是保证俄国实行文字狱政策的一个机关,遭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进步人士的抨击。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3页。

③ 同上,第12页。

④ 同上,第21页。

⑤ 同上,第16页。

⑥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卷第369~374页。

国革命前途：只有到“宗教的、智力的、经济的三种教育，循自然之趋势臻于完备，乃以无血革命收全功焉。”^①难道托翁或梁氏的结论中没有合理的成分吗？

上述情况说明，早在清代末期，这些刊物就为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流派的学说中开了先河。他们是一批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他们本人和他们的著作连同这些刊物，对于中国思想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同样想当新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这些著作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求索革命道路的印迹，而且是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也丰富了世界史的研究。这些被目为改良主义或“不符合”马列主义思想原则的刊物应该有自己的地位。

第二，这些刊物的出版透视出革新潮流不可阻挡。据清廷1906年的《报章应守规则》，百姓“不得妄议朝政”；^②而《大清报律》则严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出版发行前送审，绝对不得有“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等等。但是，这一道道上谕并没有制止民间“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的局面。眼看这些出版物在国内外层出不穷，清廷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上述无论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刊物都是冒着违犯清廷法律的危险出版发行的。刊物的发行者、撰文者为动员舆论也是颇费了周折，时时在风险之中。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

1907年12月，清政府虽然仍坚持“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但是要求改革的浪潮毕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6页。

^② 《报章应守规则》，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竟不能阻挡,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做法难以收到成效,清廷也只好做出让步,下令“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①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也在俄罗斯发生。190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也颁布《自由法典》,给予社会一定的出版和议论自由。^②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摒弃偏见,那么应该说,慑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即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那时的中外当政者也都对社会的正义要求做出过相当让步。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并非没有作用。对此,不能一概予以否定。

三、在国际背景上对这一时期孙中山

“革命派”定位的思考

首先,孙中山“革命派”的头衔得以延续下来,除了他自己的前述表示外,也还有外来因素。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的状况,与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社会主义运动中同样存在的激进与缓进(也有用左派与右派)势力间激烈斗争乃至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孙中山敬佩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便是一例。第二国际^③就此进行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当时是否要“拿起武器”,是否非“暴力”不足以表示革命性。

① 《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806页。

② 《维特档案选辑——回忆录》(俄文),详细记述了这个诏书产生的前因后果。圣彼得堡2003年版,第139~149页。《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也承认,沙皇迫于“革命形势”而作出了“接二连三的让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22页。

③ 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人撰写的两卷大型专著:《第二国际史》(Л. И. Зубок История Вещр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是一部重要的代表作。我国有中文译本,由刘金质、杨光远、高放、李石生等南开大学外文系译,张芸芳、贝璋衡等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有德国约·连茨的《第二国际的兴亡》,李庆译,斯人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

对 1905 年的俄国情况稍作回顾也许有助于问题的阐述。那时工人是举着圣像打着旗幡上街的,他们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以向沙皇请愿的形式和平游行,然而得到的是血腥镇压。农村情况就更加激烈,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所有地主庄园和财产被农民没收分配的情况。^① 这场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因争论双方不能调和而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别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本来就不应当拿起武器”,孟什维克们则根本就反对使用暴力。而列宁反对他们,认为今后一定要努力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② 明确提出了以暴力手段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差不多在相应时期,中国革命志士也进行着相同的探讨和辩论。孙中山等热情讴歌俄国志士,“斩木揭竿,风起云涌的革命局面”。但另外则有人主张温良恭俭让,“秩然秉礼,输诚而请”,梁启超明言,这样的暴力行动“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情城墟而已”。由此看来,对于同样事物的不同看法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们都是在探讨,在各抒己见。如果说俄罗斯政治活动家们的辩论,围绕的是本国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孙中山及其同时代人为之争论的议题,仅仅是停留在如何采取行动而已,或者说仅仅是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还没有把实际行动提到日程之上。

第二,孙中山在其政治生涯中同样遇到了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革命”与“反动”的问题。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彼方存在的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在孙中山这里也出现了。鉴于革命派和立宪派不能说服对方改变主意,缺乏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气氛,孙中山不无偏颇地称对方为“反动”,“反革命”。章太炎因

① H·维尔特《苏联国家史》(俄文),莫斯科 2000 年版,第 44 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12 页。